

# 24年前的一枚纪念首日封

□王 晓 义

我精心收藏着一枚唐山劳动日报社赠送的纪念首日封,至今已24年。

纪念首日封设计精美,信封左上方印有“纪念唐山劳动日报社建社六十周年”字样;右下方是毛主席题写的“唐山劳动日报”红字报头。报头右侧有一个圆形邮戳,上面有“纪念唐山劳动日报社建社六十周年 1940.1.1-2000.1.1”字样。中间背景是新唐山速写。报头左侧是金色艺术型的“60”字样。细看背景是《救国报》及《唐山劳动日报》创刊号的影印件。信封的右上角贴着一枚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整个首日封设计大气,特点突出,印刷精美。尤其是“唐山劳动日报”6个红字,让人倍觉亲切。

这枚纪念首日封,是2000年唐山劳动日报社建社六十周年之际,我去参加《唐山晚报》年度优秀通讯员表彰会时,由报社领导赠发的。当时,一起赠送的还有唐山劳动日报社编辑出版的《辉煌60年》一书,里边各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个人经历,书写了唐山劳动日报社60年的发展历程。对这两件纪念品,我爱不释手。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上中学时就



开始给《唐山劳动日报》投稿。1969年8月,在纪念毛主席为《唐山劳动日报》题写报头20周年时,我被评报社积极通讯员,并受到奖励。1970年初,我参加工作到外地。1983年调回唐山工作后,我又开始给《唐山劳动日报》投稿,直至今日。

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与《唐山劳动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工作如何变化,也不管生活上几多变故,我为报纸写稿从未间断。40年来,我在《唐山劳动日报》上发表稿件近千篇,几十次获得通讯员好新闻奖,我也连续多年被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最近,看到《唐山劳动日报》正在连载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我每期必读,很受教育和鼓舞,读后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连篇文章仿佛把我带进了炮火连天的年代,仿佛让我看到了《救国报》社的勇士冒着生命危险从一个山洞向另一个山洞转移的身影……在那艰苦卓绝的岁月,我们的老一辈党报人多么不易!他们为了及时传播党的声音,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的胜利,为了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付出了极大的艰辛,甚至流血牺牲,这就是如今《唐山劳动日报》的前身、永远不能忘却的党报摇篮!

读了报史连载,我也受到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好比看了一次难忘的抗战大戏,一部精彩的抗战电影,好比听了一次抗战专场报告,令人回味无穷,印象深刻,受益匪浅。同时也更加感到作为一名党报的通讯员,无比光荣和自豪。

从《救国报》到如今的《唐山劳动日报》,已有80多年的历史。我们衷心祝愿这张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党报,根深叶茂,守正创新,不负众望,不断前进,继续开起来,越办越好。

##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8)

□王 烁 辉

#### 4. 辗转战斗在长城线上“无人区”

(接上期)

《救国报》初到关外的办报地点在河南大峪,位于热河南部一片沟壑纵横、层峦叠嶂的山区。因清康熙年间曾将这片山区划为“后龙风水禁地”,历经250余年的封山育林,这里草木丛生,古树参天。也因此使这一带深山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人民生活贫困。自1933年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这一带人民前仆后继地投入了抗日斗争,是我党较早建立起抗日组织,成为八路军较稳固抗日游击地区的革命老区。1941年秋,冀东军区在这里建立了迁(西)遵(化)兴(隆)联合县。

这里也是日伪在长城线上建立最早的“集团部落”,许多抗日老区被集家并村。“集团部落”(群众愤慨称之为“人圈”),原是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通辽、吉林、黑龙江等地对付东北抗日联军的毒辣措施,是只允许农民在“圈”外划定的范围内耕作,其余地区为既不准居住、也不准耕作的“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

在日伪重重盘剥下,热南地区的群众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对日本殖民统治极端仇恨,面对日寇的残暴,这里的大部分群众坚决抵抗,拒不进部落,他们隐藏在深山里,期盼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到来。他们哪怕身上尚无一身完整的冬衣,也为我们队伍的赶制军装鞋鞋;哪怕自家断炊绝粮,也冒着风险四处为我们的队伍筹集口粮。

1941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冀东地委和冀东专署、军分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以及卫生部、供给处、炸弹厂、救国报社、尖兵剧社等单位多驻于王厂沟与周边一带,并且关内冀东基本区的一批村干部和抗日军人家属,也陆续转移过来,于是吃粮、物资供应、住房等都发生了困难。当地区政府便多次组织武装征粮队,兵分几路去关内和泗河川的一些部落去征粮;还组织群众突击抢建营房、窑洞,为我领导机关和部队提供了简陋而极宝贵的居住条件。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不断向敌人后方深入发展,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惊惶与不安。1942年底,伪满日伪军为配合华北日军在冀东之行动,从山海关到张家口的长城沿线,部署了数百万日军和伪满军,进行疯狂的“扫荡”。在伪满洲国和冀

东地区之间造成一条所谓的隔离地带,制造“无人区”。

重兵压境,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腹背受敌。

这一时期,日军在热南地区久驻不走反复“扫荡”。为避免给群众招至无谓的牺牲,且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在沟壑如网、碉堡如林的分割封锁下,主力部队、冀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大批地方干部的武器弹药、物资、人力的补充亦无法解决。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冀东地委于1943年1月5日,在热南根据地兴隆县河南大峪召开会议,决定武力突破长城封锁线,回关内恢复被“蚕食”的基本区,会议同时决定:在基本区要大力加强统一战线和宣传工作。

1943年2月,八路军主力部队分三路进军,以较低的伤亡打回关内,并开始恢复基本区工作。为了坚持报纸出版发行,崔林也带领部分《救国报》同志在1943年春节前后,先期回到关内准备报纸出版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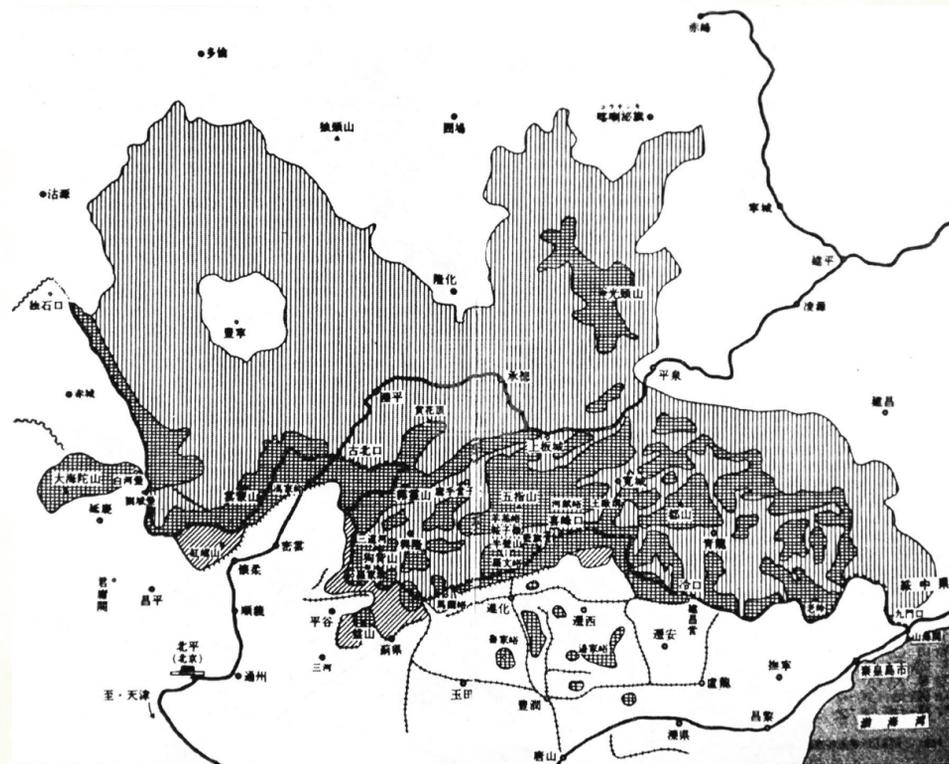
在此之前的1942年底,党组织派来一批从根据地走出来、经验丰富的党政干部支援冀东建设。在宣传方面,派曾任陕西西公学教务长的吕光同志到冀东地委任宣传部长;派曾担任《晋察冀日报》编辑的顾宁(原名牟伦扬,曾化名司马军城)担任《救国报》编辑(相当于后来的总编辑)。

这时报社的工作有显著的进展,领导力量加强了,而且有了电台,可以直接收到在延安的新华社消息和听到党中央的声音,这对报社的同志是个很大的鼓舞。不仅每期《救国报》的间隔时间缩短了,而且还翻印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印出的报纸和书籍,通过新建的转运站,及时发送到关内外,分送到读者手中,有力地配合了全区军民粉碎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

1943年二三月间,时任中共晋察冀第十三地方委员会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的李楚离和时任冀东区党分委

东部地委书记的周文彬,赴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汇报冀东工作的补充报告》中,专门提到了《救国报》:“报社工作归区党分委。报社于1939年冬开始成立,至今出了不到90期,多的时候五六千份,用乡村沿村传送。内容为国际国内消息与地方新闻,其后附了一个副刊,主要是斗争中英勇的实例。在青年报国会中组织了读报组,在各地人民中受到很大的欢迎,尤其是本地区的消息。分发上有困难,尤其是较远的地区。1942年春,报社受了损失,牺牲了很多人,现在分成3个印刷所出版。”

在崔林进关不久,吕光也相机带领报社其余同志转移到迁西县滦河东岸的山区与崔林会合,《救国报》在迁西继续出版。此后,吕光担任中共第十三地委宣传部部长兼救国报社社长,崔林(约从此时起化名李杉)转任第十三地委秘书处秘书。(待续)



这是日寇于1945年绘制的华北和热河无人区范围图(局部),是侵华日军实行野蛮统治的罪证。图中网状线部分为“无住禁作区”;斜线部分为“封锁地域”;竖直线部分为“集团部落(集家并村)”。从图中可以看到,当时抗日军民的环境十分艰苦。

## 「海阳三周」名扬故里

□张 浩 洪

在河北省滦南县柏各庄村,有曾经清正为官、名扬故里的周氏祖孙三人,他们的业绩,至今仍令人交口称赞。

周慎枢,字懋卿,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纺线织布才得以在本村从师就学。13岁读完“五经”,开笔做文章。有一天,老师把周慎枢叫到身边问道:“为师发现你有治世之才,日后当真做了官,你将如何为政?”慎枢回答说:“如果我真的做了官,当顺民心,行治道。”可惜由于屡试不第,他便随经商的哥哥去了辽左(今辽宁省),在奉天(今沈阳)一个富户人家教书。后来,他捐了典史。不久,升任辽左盖州(今辽宁省盖州市)巡检,清光绪元年(1875年),又升任江西同知,到铜鼓县任职。这里地处边远山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所生女婴多被溺死。周慎枢到职后,就把亲自拟好的几篇劝诫溺女婴的文告发到各个城乡,进行大力宣传。由于恶俗沿袭日久,收效甚微。于是,他召集士绅会商,决定在铜鼓城内创办育婴堂。周慎枢带头捐款,绅民纷纷效仿,仅用几个月的时间,便捐足了款项。育婴堂建成之后,周慎枢亲自制定规章制度。那些嫌弃女孩的家庭,可以把孩子送进育婴堂抚养,周慎枢经常去育婴堂巡视。每到年底,由育婴堂将婴儿各种款项开支,刊刻“征信录”送达捐款的人们,使大家明了钱款的去向。对于那些离城远,送女婴不方便的人,可由自家抚养,由育婴堂酌情补助。补助的办法是:极贫人家每年周济6个月的钱米;次贫人家每年周济3个月的钱米。女婴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与孩子的感情,也就不忍心抛弃了。如果发现有人私溺女婴的,给予严厉惩罚。两年后,虐待女婴的恶习终于杜绝,周慎枢受到百姓的赞扬,朝廷也将他由铜鼓同知升任知府。

周慎枢在铜鼓连续任职16年,深得百姓爱戴,当地人自发地为他修建了生祠。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因年事已高,告老回到柏各庄颐养天年。光绪十九年(1893年)病故,享年82岁。

周憬,原名周文藻,字采臣,系周慎枢长子,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生。周憬自幼勤奋好学,寒暑不辍,善于思考。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人,出任工部郎中。他任公职之余,潜心研究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对此,有人不理解,认为他学的东西与做官无关,他说:“要想国家富强,必须首先提倡新学,否则中国就不能强盛。”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不久,中国海禁大开,与外国交涉的事情越来越多,国家亟须专门人才。因周憬精通西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提拔为北京典章提调、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办。他在任期间,兢兢业业,勤于职守,培养了一批人才,同时也传播了维新思想。不久,他被调往云南,历任临安府、东川府、曲靖府、楚雄府、云南府、开化府知府。他每到一地,见当地风气闭塞,陈俗旧习根深蒂固,青少年求学者甚少,深感痛心,于是便竭力提倡新学。在东川府任上,他见旧的上层人物写八股文章,迷恋科举制度,便决心改变这种旧习俗。他在知府署内创办了中学堂和陆军小学堂,聘请几名品德端正、学业精深的教员任教。他还在从政之余,担任算术、英语、理化、史地等课程的教学。每年办学经费白银达千两,全由他个人资助筹集。他曾对人讲:“应该做的事,有钱要做,没钱也要做。”由于他倡办教育业绩显著,许多人背着书籍来东川求学。经考试,唐继尧出类拔萃,周憬亲自保荐他去日本留学。后来,唐继尧有所作为,与周憬的大力扶植是分不开的。在开化府上,周憬遍设学堂,兴修水利,受到民众的爱戴。当时革命潮流震动全国,周憬因施政太新潮而被调回东川,为此他愤然辞职还乡。百姓闻讯,攀辕相送。

1912年,周憬栖身津门。1917年天津发生水灾,周憬目睹,慨叹道:“此非天灾,皆因治河无术。”后来他应水利局聘,撰述五大河流,提出许多兴利除弊的良策。当时给他报酬,他坚辞不受,并说:“为桑梓服务,非图利也。”

周憬治学严谨,对孩子们要求很严,他常对儿孙说:“读书方能明理,吾不欲与汝等留产业,而欲与汝等遗学问。”在他的指导下,儿孙们皆潜心研究学问,大多成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栋梁之材。1920年周憬卒于天津,享年72岁。

周予觉,字尹任,周憬长子、周慎枢嫡孙,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他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新旧学基础扎实,且善于骑射,不满20岁就协助任知府的父处理政务。在东川府父亲办的学堂里襄理校务并兼任英语、算术教员。父亲从开化回原籍,他随父北返,入天津北洋讲武堂。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南方革命如火如荼,予觉从北方赴南京,投身革命,任临时总统府秘书。接着被授予陆军步兵中校,继而升任少将,1919年任总统府侍从武官。1925年卒于南京,年仅37岁。生前著有《应用武学问答》一书发行之世。

由于周氏祖孙三人皆为官员,并在任期内悉心理政、潜心想民,给家乡增添了光彩,至今柏各庄的人们提起三人来仍是津津乐道。由于此地历史上曾由“海阳县”管辖,所以,爷儿三个被后人称为“海阳三周”。